

文化研究读本

Cultural Studies:

An Essential Reader

主编 陶东风

IAS 励学文丛

主编 周宪

文化研究读本

主编 陶东风

Cultural Studies:

An Essential Reader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研究读本 / 陶东风主编.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6

ISBN 978 - 7 - 305 - 07110 - 2

IAS 励学文丛

I. ①文… II. ①陶… III. ①文化-文集
IV. ①G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99087 号

出版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版人 左 健

丛 书 名 IAS 励学文丛
书 名 文化研究读本
主 编 陶东风
责任编辑 陈蕴敏 姚 徽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江苏凤凰盐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张 35 字数 467 千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07110 - 2
定 价 58.00 元

发行热线 025 - 83594756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导 论

早在1977年发表于《屏幕》杂志的《文化研究的评价》中，柯林·斯巴克斯(Colin Sparks)就指出了界定文化研究的困难乃至不可能：“在任何精确的程度上界定文化研究都是极其困难的。给文化研究画一条清晰的线索或说我们从一个侧面发现文化研究的适当领域是不可能的，指出足以标志文化研究之特征的整齐划一的理论或方法也是不可能的。由来自文学批评、社会学、历史、媒介研究等的观念，方法和关切组成的地地道道的大杂烩，都在文化研究的方便的标签下面杂陈在一起。”^①二十年以后，斯道雷接着指出：虽然有文化研究的各种学位、杂志、会议，等等，却没有精确的“什么是文化研究”的答案。^②尽管如此，但关于“什么是文化研究”的探索却一直没有停止过。就像我们一方面认为“美”是不可定义的，另一方面却又在不断地给“美”下定义。国外一本又一本的文化研究读本类的出版物，实际上都在从不同的角度试图解释“什么是文化研究”的问题。我受周宪先生之命编的这部选本，也未尝不可以看做这样的一个尝试。

把握一个学科或一个不能归入学科的知识探索领域(如文化研究)的方式之一是回顾它的历史。这一点也适用于文化研究。关于文化

① Colin Sparks, "The Evaluation of Cultural Studies," see *What Is Cultural Studies: A Reader*, ed by John Storey, First published in England in 1996 by Arnold. p. 15.

② John Storey, "Cultural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Ass What Is Cultural Studies: A Reader*, ed by John Storey, First published in England in 1996 by Arnold. p. 1.

研究历史谱系的描述已经很多，这种描述本身已经成为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它也成为许多文化研究者争论的焦点之一。实际上，许多所谓的“理论”问题正是借助历史研究而提出或深入或得到修正的。文化研究也不例外。

回顾历史常常是因为不满于现状，同时也意味着对未来的一种想象。保罗·史密斯的《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是一篇通过对欧洲和美国的文化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的反思，来展望文化研究未来的文章，其核心的观点是必须复活马克思主义以重新激活文化研究。作者在文章中可谓“逆历史潮流而动”，对文化研究传统中的反学科化和多元化取向提出了质疑，显得非常另类。保罗·史密斯自称具有双重身份：在英国文化研究的理路中接受教育，却在美国度过了将近二十年。所以，作者的探讨常常就是借助于文化研究的英国“观点”和美国“观点”比较而展开。

保罗·史密斯的文章首先批判性地解读了斯图亚特·霍尔影响深远的对于文化研究的历史和方法的归纳。在《文化研究：两种范例》等著名文章里，霍尔认为，文化研究应该避免任何关于“文化到底是什么”的定义，也不应该在方法论上有所偏爱。这种多元论倾向认可了文化研究采取多种形式，并获得众多文化研究者的赞同。他们认为，文化研究的特点就是逃避与拒绝学科规范。这使得文化研究者缺乏界定自己的核心研究对象的意愿，也缺乏方法论上与程序上的连贯性。这种观点是非常流行的。出版于1992年，在文化研究领域最有影响的文集《文化研究》的编者们在“引言”里就坚持和重申了这种立场，认为在文化研究中没有任何方法论可以被赋予特权，也没有哪种方法论可以被排除在外。^①

《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的作者认为，这个多元论立场在文化

^① 参见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 Grossberg)等编《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导言”部分，Routledge, 1992。

研究领域里已经被极大地内化了，以至于人们普遍认为，任何向着一种“学科化”的文化研究的转移，都会被认为是独裁主义的，是与文化研究对立的。但是倡导文化研究的这种开放性、松散性或未完成特点，其代价是把文化研究变成了一种充其量是“折中主义的努力”，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则变成了“无原则的知识努力”。为了避免这种现象出现，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 Grossberg)曾经认为，文化研究虽然是反学科化的，也不先验地界定自己的对象与方法，但是我们也不能说什么东西都是文化研究，文化研究的特点正是体现在它始终坚持从现实的需要出发，灵活地选择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但是保罗·史密斯指出，格罗斯伯格的这种解决方法可能导致一种“观望的方法论”，“知识的对象将自动地证明适合它的分析方法，或者说，方法和智力活动可能以某种方式凭空产生，以便应付各种变化的情况和各种现象。这样一种观点把对象与知识之间的关系神秘化了”。文化研究“没有任何集中的对于对象的界定，却有一种相当于‘一时心血来潮的’或者仅仅是机会主义的方法论，文化研究于是就只可能根据它所探讨的各种话题来证明它自身。换言之，文化研究所能做的仅仅是成为一个在论题方面有条理的研究领域，在其中，选择特定的话题或论题，最终要比选择方法或程序更为重要”^①。

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保罗·史密斯提出了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重新结合的必要性。过去，文化研究曾经与马克思主义紧密结合，与对资本的分析结合。但是这种结合后来被渐渐淡忘了。保罗·史密斯认为，这种结合在今天看来应当处于对文化的一切严肃思考的核心。特别是在美国，人们热衷于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主义，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影响下的美国文化研究大大地削弱了马克思主义。保罗·史密斯举例说，在近来出版的论述当前文化研究领域之状况的文集《备受怀疑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 in*

^① 参见本书所选保罗·史密斯的《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Question)中,马克思主义被提到的次数很少。文化研究中最为经常地被人重复的对马克思主义批评包括:马克思主义既是“简化论的”又是“经济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对阶级立场的强调必然会排除对主体性的其他形式的能动研究,尤其是对种族和性别的能动研究。保罗·史密斯认为,文化研究回避谈论文化生活中的决定关系,这种缺席实际上认可了对于那些通过主题方面挑选出来的、彼此孤立的各种文化要素进行孤立的处理,这些要素无法与生产方式建立起重要的联系。“也可以说,在极端的情况下,这样一种缺乏,认可了一种就各种文化对象或事件而进行的理解工作,那些对象或事件在实质上作为‘文本’,与它们产生的场所或各种条件没有任何必然的关联。”在保罗·史密斯看来,必须创造一种能够将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结合,能够分析生产的不同层次之中和之间各种决定性过程新的文化研究形式。这意味着,我们不能认为任何文化形式或任何一种文化制品或事件是独立存在的。相反,文化现象完全不是各种独立存在的文本,而是被一种“总体性的逻辑所捕捉到的”(詹姆逊)。

正如本“导言”下面将要进一步介绍的,对于后现代式文化研究的反思和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模式的重新重视,已经成为文化研究最近的重要趋势之一。

本·卡林顿(Ben Carrington)的《解构中心:英国文化研究及其遗产》同样是一篇史论结合的文章。文章一方面清理英国文化研究的历史叙事,一方面对一些文化研究的理论问题进行反思。作者首先批评了那些对英国文化研究的发展过程所作的分阶段的单线阐释,这些阐释首先将文化研究史看成是一段分离的学术史。结合对于文化研究的这种“官方”历史叙事的质疑,作者重点探讨了以下问题:文化研究的起源,文化研究内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的关系。

关于文化研究的起源,本·卡林顿认为,一般关于文化研究历史的叙述都开始于理查德·霍加特的《识字能力的用途》、雷蒙德·威

廉斯的《文化与社会》和《漫长的革命》，这些书都出版于20世纪50年代晚期，而1964年成立的“英国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则被认为是最早的文化研究机构。在本·卡林顿看来，虽然某些个人在某些特殊的时刻是重要的，某些机构的确会成为某类特殊的知识活动的焦点，但这种叙述存在的一个问题是过分强调学术文本的出版，认为这些文本“生产”出了文化研究。本·卡林顿的观点正好相反，认为这些学术文本本身是“自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起在成人与工人教育学院内部产生的、旨在实现社会变革的更为广泛的社会政治教育过程的结果”^①。在三、四十年代，对最早的“文化研究者”来说，“文化研究”首先指的是成年工人教育，而推动成人教育事业的则是这样一个非常具有政治性的期待：创造一个真正社会主义的民主社会。这促使许多教师将工人教育和对于日常生活的分析当成了一种政治斗争。工人成人教育是一种扎根于人们日常生活经验之中的教育实践方式，而正规教育从来没有向人们提供过这种教育。正是这种成人教育提供了产生文化研究的背景。本·卡林顿引用汤姆·斯蒂尔(Tom Steele)的话说：“从独立的工人教育运动的余烬中出现了文化研究的凤凰。”文化研究首先是一项为了工人阶级的大众教育而进行的政治事业。

与此相关，本·卡林顿认为“英国文化研究”这个简述方法容易产生一种幻觉，好像存在统一的、无差别的所谓“英国文化研究”。这样，关于英国文化研究历史的叙事，常常是以牺牲英国文化研究的差异性、多样性为代价而确立的。比如，关于英国文化研究的历史叙述常常忽视性别问题(这个问题在本书所选的伊丽莎白·朗格《女性主义与文化研究》中也作了反思)；再比如，许多研究几乎不提种族结构在说明英国民族主义问题当中所起的关键作用。本·卡林顿指出，为了理解文化研究出现的背景，必须了解英国在战后时期出现的广泛的社会文化变革，特别是在那个时候，由于严重缺乏重建基础设施的劳动力，英国从自己

^① 参见本书所选本·卡林顿的《解构中心：英国文化研究及其遗产》。

以前的殖民地招收许多有技术的手工劳动者以及护士和医生。从亚洲、非洲尤其是说英语的加勒比地区而来的移民，决定性地改造了英国政治的本质、内容和形式。但是由于传统的、权威的文化研究的著作对于民族问题的忽视，由于他们对于文化研究中存在的民族主义缺乏必要的警惕，以至于没有能够建立真正多元的文化研究模式。

在某种意义上，澳大利亚学者格雷姆·特纳(Graeme Turner)的《为我所用：英国文化研究、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和澳大利亚电影》(*It Works for Me: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Australian Cultural Studies and Australian Films*)一文是对上述观点的呼应和深化。如果说卡林顿的文章强调的是英国文化研究内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那么，特纳此文则采取了国际视野，它讨论的是英国文化研究的文化特殊性(the cultural specificity of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以及它在其他的政治或民族语境中的适用性问题。特纳指出，英国的文化研究正在机构化，它正面临成为一种教学法事务而不是一种批判性或政治性事务的危险。英国的文化研究曾经致力于抵制与反抗普遍主义，为此，它不承认自己是一门新的学科，更反对自己成为人文与社会科学中新生的正宗或普遍话语；“而现在，却的确存在一种经由英国文化研究的输出与发展而造成的普遍化的动势”^①。他援引了鲁思文(K. Ruthven)关于威廉斯的《关键词》的一篇论文的观点。鲁思文批评了《关键词》一书隐含的普遍主义，指出，对于这些所谓“关键词”的辨析行为本身就是“阐释过程的产物”，而这个阐释过程则是“为一种意识形态立场服务的”。更重要的是，这种意识形态立场本身就具有历史与文化的特殊性。对于这种特殊性，威廉斯本人可能不会否定，但是此书的广泛传播以及威廉斯的威望与影响，使得他的工作被赋予了普遍主义的含义。特纳通过大量的分析表明，《关键词》一

① 参见本书所选特纳的《“为我所用”：英国文化研究、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和澳大利亚电影》。

书的“正宗化”在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中产生的结果之一是，它已成为对澳大利亚的文化差异性（相对于英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遮蔽与压抑，如欲解除这种遮蔽与压抑，就必须把英国的文化理论在澳大利亚的文化特殊性中重新语境化。比如，通过比较的、对澳大利亚自己的文化“关键词”的辨析，才能重新发现这种差异性。特纳提请我们要特别关注文化理论——特别是逐渐被人们当做“正宗”加以接受的、占支配地位的文化理论——与生产它们的特定历史条件的关系，因为“占支配地位的理论与实践比它自己承认的要更加受制于特定的文化”^①。而一种理论与方法如果脱离它产生的历史特殊性，就会普遍化、自然化，从而阻挠新的发现与突破。在特纳看来，人们对于理论的实践价值的认识往往是比较清楚的，他们热衷于把一种新理论运用到实际的分析中；不那么清楚的则是理论与理论得以从中发展出来的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而文化研究的历史表明，大多数产生重要理论成果的那些研究，恰恰在于抓住了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并在此基础上建构、发现新的理论话语，或拓展、修正原有的理论话语。

从语境化的角度看，英国的文化研究视点当然是地方性的（虽然它是文化研究的发源地），然而这种英国式视点常常被无意识地扩展与普遍化。比如，在传媒的研究中，特纳发现许多人自觉不自觉地认为，英国电视的文本与结构特征既适用于英国也适用于世界各地，它们是标准式的，而世界其他地方的电视只是提供了这个标准的“变体”。在20世纪70年代许多关于新闻与时事的研究中，对于英国传媒的指义实践的研究被认为是对于一般的传媒指义实践的研究。更有甚者，英国的传媒研究把其他的传媒系统综合到它的变体中，而后者历史的、政治的、社会的特殊性则被忽视。^②

① 参见本书所选特纳的《“为我所用”：英国文化研究、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和澳大利亚电影》。

② 同上。

特纳把这种倾向称做“盎格鲁中心主义”(Anglocentrism)。英国的文化研究只说“大众文化”而不说“英国的”大众文化,只说“电视技术”而不说“英国的”电视。英国的文化研究从英国与欧洲的中心自以为是地向世界各地发表演说与“指示”,而“边缘”地区的观点是很少被考虑的。特纳深刻地指出:“对于文化之间而不是文化内部的差异的不敏感性,或许正是当代文化研究实践中流传最为广泛的疾病。”^①其结果常常是悖论式的:一种批判性的激进理论被搬到不同的语境中时很可能丧失其批判性与边缘性,甚至变成中心化的保守话语。比如,在谈到英、美两国的大众文化研究时,特纳说:“对于观众的重新发现,对于观众所使用的抵制策略的新理解,以及这些策略在大众文化界定领域的启用,等等,都是英国文化研究中重要的、纠偏的发展。但是它们进口到美国,就进入到了另一个语境中,在这个语境中,大众的观念在支配性的文化界定中占据一个非常不同的位置。这种理论进口似乎已经加剧了由对于观众新的解释导致的文化乐观主义的扩张——说到底,这是一种关于资本主义及其对于反抗的宽容的乐观主义。”^②

熟悉英、美两国文化传统的人自然知道,英国是一个精英主义传统比较深远、高级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划分比较严格的国家,其大众文化(注意不是工人阶级文化)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带有精英主义倾向,具体表现在对于大众观众(popular audiences)的积极性、能动性的低估。70年代以后,以约翰·费斯克等人为代表的英国文化理论家试图扭转这个传统,倡导大众观众在文化接受与理解过程中的主动性,建构一种积极乐观的大众文化理论。^③但是,这种新的研究取

① 参见本书所选特纳的《“为我所用”:英国文化研究、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和澳大利亚电影》。

② 同上。

③ 费斯克的研究可以参见他的《电视文化》(Television Culture, London, 1987)、《理解大众文化》(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 London, 1989)等书。

向在美国却产生了不同的效应，因为美国文化本来缺少精英主义传统；相反，大众文化在整个文化中的比重很大，乐观的大众主义盛行不衰。在这样的语境中，费斯克等人的理论“出口”就失去了其在英国的激进性与批判性。

特纳最后重申：“我的目的是强调，有必要承认即使是理论也有某些历史的定位与特定的语境，在这种语境中理论为特定的目的服务。如果我们不加反思地接受英国的文化研究模式的支配地位，那么它就是具有内在危险性的。但是迄今为止我们没能质疑这种支配的本质与结果。……文化研究可以从边缘得益颇多，它应当尽其所能去研究边缘文化的特定状况要求修正来自别处的解释的途径。文化研究的这种扩展至少可以阻止新的普遍主义的发展。”^①特纳的文章虽然是针对澳大利亚的文化研究写的，但对中国的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为相比于澳大利亚，中国的语境更具有（相对于英国和美国而言的）特殊性，而中国的学者对此的认识却相当不够。^②

文化研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关于文化研究作为一门知识探求领域的特征等理论问题，既可以通过回溯历史的方式得以思考，也可以从文化研究和各个学科之间的关系的角度来思考。它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也一直是文化研究者关心和争论不休的问题。

上面提到的本·卡林顿的《解构中心：英国文化研究及其遗产》强调了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的内在关联，提出应该消解两者之间已经并

① 参见本书所选特纳的《“为我所用”：英国文化研究、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和澳大利亚电影》。

② 参见陶东风《文化研究：西方理论与中国语境》，《文艺研究》1998年第3期。

正在强化的紧张。文章指出：社会学家一般认为，理论建构比直接的社会政治分析和政治行动更重要，并尝试建立一种实证的社会学形态，追求自然科学“客观性”，文化研究因此就被看做有意识形态导向的“政治计划”。社会学家容易认为传统的社会科学概念是客观的和价值中立的，而文化研究采用的学术方法基本上是反社会学的，远远不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文化在社会关系结构中发挥作用的动力，它现在已经变成了一项“肤浅而无用”的工作。

另一方面，凭借文化研究理论家们作出的一系列与社会学家同等重要的理论贡献，文化研究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还击社会学。文化研究在过去几十年中的确为社会学提供了新的推动力，但是也遭到了一些更加传统取向的社会学家的反对和怨恨。

这样一来，文化研究和社会学就陷入了一种无益的“战斗”。“文化研究并不打算否定社会学的观点的重要意义，而试图通过将社会学的观点融入新的理论框架，即在那些关于统治、文化管理和权力话语制度的话题中——来扩展它们的意义。”^①本·卡林顿甚至认为，在社会学与文化研究之间所作的区分在许多方面是虚假的，它夸大了它们之间分歧和想当然的所谓不相容性，忽视了如下事实：建立社会学的许多经典理论家曾经很关注文化和意义方面的问题，而现代社会学则更多地采用结构—功能主义方法，而忽视了这一点。尽管文化研究的倡导者经常声称拥有一个多重的(multi-)或交互的(inter-)学科基础，吸收了历史学、政治学、美学和文学理论等学科，但真正为大多数文化研究提供了主要的“元概念的”(metaconceptual)构架的，还是社会学。作者指出：许多在“文化研究”领域所作的研究，是在社会学系内部进行的，或者是以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社会学通常出现在前面)教授的身份来做的。尽管现在许多社会学系在研究项目、教授头衔和设立新研究中心等方面作了调整以适应文化研究日益巨大的影

① 参见本书所选本·卡林顿的《解构中心：英国文化研究及其遗产》。

响，但是，与某些夸张的宣言相反，从整体上看，它们并没有被文化研究机构所替代。将二者（文化研究与社会学）分离没有丝毫意义，既歪曲了它们内在的共生关系，也无法很好地理解文化研究以何种方式在理论、方法论和概念方面对社会学产生了重大改造。即使在文化研究发展的初始阶段，那些后来在发展社会学的体系方法方面被视为核心人物的学者，也参与了文化研究的奠基性的工作。例如，卡尔·曼海姆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首次从德国移居英国时，就对工人成人教育协会的活动很感兴趣，他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界定了从事成人教育的教师们的角色：自身既作为教育者又向工人阶级传授解放教育。这对从事成人教育的教师有非常大的影响。而成人教育被公认是英国文化研究的重要发源地；他还将欧陆的批判的社会哲学输入到更为经验主义的英国学术界，这种输入随后证明对新左派的产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引述斯蒂尔的话说，曼海姆在战后以及随后时期的著作“通过让当时的社会学学术实践面对文化问题，将其纳入跨学科的成人教育实践，使社会学学术实践发生了改变，为战后的文化研究一代铺平了道路”^①。

詹·韦布的《文化研究与美学：快感和政治》探讨了文化研究与美学、快感与政治结合的可能性。文章援引尼采、伊格尔顿等人的理论认为：美学是我们物质生活的一部分，是我们生存的一部分，是“应用生理学”。作为生物学的艺术把感性和理性联系在一起，把欲望和社会性联系在一起，它强烈地质疑艺术的客观可能性。艺术快感以它所有的动物性和本能享乐性驻扎在“肌体”里，而不是“精神”里，很难管理、控制它或者把它合理化。我们应该认真考虑艺术创作和“生活过程”的关系。这样的思考把艺术带回到普通的日常生活。美学没有必要极力主张或坚持资本化了的的价值，但是可以研究美学成为“身体话语”（伊格尔顿语）和社会话语的方式。这种

^① 参见本书所选詹·韦布的《文化研究与美学：快感和政治》。

话语凸显欲望和物质性，这样一来，它也能被用来思考公正、伦理、社会组织、权力和性别，等等，所有这些因素使我们成其为人。

在这方面，美学提供了文化研究所重视的那种僭越或者斗争的可能性。通过反思社会的偶然性以及美学和日常生活的重叠，通过把物质性带回到理智、趣味和伦理之中，就可能思考一种能促进文化研究的政治目的的艺术欣赏方式——摧毁分类系统，动摇特权实践，搅乱学科界限。这样，就不存在普遍的审美的或伦理的真理的主张，而只存在团结社会及其紧急事务的有用而公平的方法，以及使我们成为我们的有用而公正的方法。最后，文化研究和美学之间的一种跨学科的好奇态度，可能使我们能够吸取后美学思想提供的长处，而又不把艺术品简化为简单的商品和只供分析的文本；另一方面，也不把艺术恢复到以前被当成大写的艺术的地位。文化理论家能够利用美学的各个方面，特别是感官体验的概念，而又不坚持康德的快感的无限延迟（观点），或者改变快感的方向使之纳入到社会的行动性（social performativity）。文化理论家可以把审美体验视为多样的、潜在有趣的，但是总是处于斗争之中的主体性提供场所。凭借文化研究和美学共同拥有的前提，在把快乐和感觉的概念交还给艺术体验的同时，我们能够批评艺术的世界并使它陌生化。

安德鲁·罗斯的《科学的挑战》顾名思义是关于科学对文化研究的挑战以及文化研究如何回应这个挑战的。文章追问了两个问题：“谁有资格批评科学？”“文化研究必须对科学说点什么？”文章涉及科学研究中一个非常坚固的、习以为常的传统信念，即科学是价值无涉的领域。这种科学“心态”渊源于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著名讲演《以科学为志业》（1918年）中提出的观点：人文科学应该成为价值无涉的中立研究领域。在当时，这种价值无涉的提法主要是为了回击德国的反犹太主义思潮，但一旦成为科学研究的信条，则未免表现出自己的局限性。罗斯的文章详细而有力地论证了关于价值无涉的科学假定为什么必须接受批评。

本文作者罗斯在美国工作，在那里，技术科学(technoscience)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绝大部分学术工作的绝对中心，甚至在人文科学领域也是这样，科学技术是财富的发源地。而且，在科学领域，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抵制非科学人士对科学工作的社会文化基础、社会效果进行检讨。一般人断言，文化研究是伪学科，缺少处理诸如科学之社会文化效果这些议题的严格概念。罗斯明智而又谦逊的论文则是对这种断言的回击。他论证说，科学如此强大和细密，不仅渗透而且塑造了现代文化，因此，若不去对它及其效果进行外部分析，以及追问“为了创造一个更加公平和更少风险的社会你打算做些什么”这样的问题，科学就是不负责任的。实际上，今天这个所谓“风险社会”的许多风险，正是科学的发展及对于科学用途之控制的无效、无力而导致的。文化研究必须责无旁贷地反思这个问题。

考虑到国内学术界目前正在进行的关于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之关系的讨论^①，韦伯斯特的《社会学、文化研究和学科边界》特别值得重视。文章开始时，给我们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1963年，英国伯明翰大学现代英国文学教授、一年后成为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首任主任的霍加特，发表了教授就职演说。他是作为诗人奥登的研究专家被评为教授的，但他的主要成就却不在奥登研究方面，其方法也不符合当时英国文学研究界的所谓学科规范，且超出了文学研究的学科边界。早在1957年，霍加特就出版了他的巨著《识字能力的用

① 这方面的文献参见陶东风：《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陶东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兼论文艺学的学科反思》，《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金元浦：《别了，蛋糕上的酥皮——寻找当下审美性、文学性变革问题的答案》，《文艺争鸣》2003年第6期；王德胜：《视像与快感——我们时代日常生活的美学现实》，《文艺争鸣》2003年第6期；金元浦：《当代文学艺术的边界的移动》，《河北学刊》2004年第4期；童庆炳：《文艺学边界三题》，《文学评论》2004年第6期；陶东风：《开放文学理论》，《文学评论》2004年第6期；陶东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学的学科反思》，《现代传播》2005年第1期。

途》。此书已成为文化研究的重要经典。但它却是无法归入任何学科的一本奇书。霍加特后来回忆说：“我所遇到的英文系的许多老师对此书保持沉默，好像议政厅的边门跑出一只讨厌的老鼠带入了奇怪难闻的东西。”^①而社会学家则认为它不法地闯入了自己的跑马场，对其极为个人化的自传式写法颇不以为然。《识字能力的用途》上半部分写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里兹周围的工人阶级生活，下半部分则对包括拳击、流行音乐、流行杂志、性与暴力小说等在内的各种各样的新现象进行了广泛批评。内容几乎无所不包，夹杂了许多个人的童年经验，所以既不合乎当时社会学的规范（包括题材与方法），也与正统文学批评相去甚远。但是一个最重要的事实不容否认：工人阶级本身非常喜欢这本书。韦伯斯特曾经采访过一个15岁就开始在铁路上干活、后来上了大学的工人弗兰克，在谈到这本书的时候，弗兰克眼睛放光，兴奋地说：“（在这本书中）你能够听到血肉丰满的人的声音并感受到他们的存在，你可以通过绝大多数社会学不能提供的方式进入现场。”^②这难道不比什么学科不学科的更加重要吗？

文章指出：虽然霍加特以及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计划远远超出了文学，但他创立该中心的本意却并非取消文学研究，而只是要扩展其边界。据说当时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又称“文学与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上面提到的霍加特的就职演说发表在他的文集《相互言说》（*Speaking to Each Other*）第二卷，其副题就叫做“论文学”（*About Literature*）。更有意思的是，文化研究中心成立的时候据说只有两个人，除了霍加特，另外一个英语文学的研究生、牙买加人斯图亚特·霍尔（S. Hall）。霍尔在成为《新左派评论》的编辑之前做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小说家亨利·詹姆斯的。由此可见，文化研究在起源时就与文学

① Richard Hoggart, *A Sort of Clowning, Life and Times, 1940-1959*,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90, p. 147.

② 同上。